

**编者按：**2020年11月25日，芒克对话主持人鲁德亚德·格里福茨（Rudyard Griffiths）与张维为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话并与世界各地听众直接互动。这场对话先后涉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北美及欧洲的种族问题、党的领导、中国模式、“新疆问题”、中西方生活水平比较、中西方多元化社会比较、“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战狼外交”、中美关系、中国的“红线”、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加关系与孟晚舟事件等近20个敏感的热点话题。这场对话播出后，海内外好评如潮，可以说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场平和理性的中西方高质量对话。虽然外方提出的问题尖锐甚至刁钻，但主持人保持了公正和礼貌，明确表示愿意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张维为的回答则坦诚犀利、举重若轻。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推动原创性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又一次成功尝试。芒克对话与芒克辩论一样，是芒克论坛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平台。这次对话也是中国研究院2020年思想者论坛的最后一场活动。以下是对话全文。

## 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 一场平和理性的中西方对话

张维为

**【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鲁德亚德·格里福茨，是本次芒克对话的主持人和组织者。过去几周，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大选的余波，深入探讨民主的未来，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它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今晚，我们将继续关于民主的对话，我们今晚将再次以一种国际视角，展开我们与全球思想者的对话。我们今天请来了张维为教授，他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曾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英文翻译，是位非常杰出的中国学者，他出版的《中国震撼》《中国超越》等著作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张教授，欢迎您来到芒克对话。

**【张维为】**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很期待这次对话。

**【主持人】** 关于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我们有很多东西想和您探讨，但我想先从民主这个话题谈起，我想知道，您，你们中国人，对今天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看法，特别是在这一场存有争议的美国大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怎么看？更重要的是您认为它哪里出错了？

**【张维为】** 我认为整体上，西方的政治体制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但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它的劣势开始超过它的优势。这是今天许多中国人的普遍感觉。我经常说，自由民主在西方的运作方式存有几个基因缺陷。一是它的预设：人是理性的。现在这个预设越来越难成立，随着金钱卷入、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人越来越难保持理性。二是权利是绝对的。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权利和责任总该是平衡的，否则一个现代社会将无法高效运行。三是程序是万能的，程序对了，其他一切就都对了。

如果你看中国的治国理政，西方也许可以参考我们的某些理念。一个理念叫“民意”，跟英文中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的意思接近。另一个叫“民心”，这个理念很难翻译，大致等于“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也就是民心向背，或者叫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两个概念。我们看到在西方政治模式中，越来越根据公众舆论，而非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来治理国家。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顺应民心，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治国理政才是关键。公众舆论可能反映人们的长远利益，也可能不反映。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信息瞬息万变，人们的心情每几个小时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这种把“民心”和“民意”加以区分，在治国理政方面有时候很有意义，至少在中国是行之有效的。

另一点就是，我们治国理政中讲究“道”和“术”的关系。“道”是大目标，“术”是具体做法，“术”

归“道”管。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或西方政治体制难以进行真正改革的原因。僵化的法治是一个主要障碍，我把这叫作僵化的法条主义。举个例子，在美国支持控枪的人很多，可能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控枪，然而你想要改革，就得修改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这在程序上实现不了，这种僵化的法律程序阻碍了必要的改革。中国有学习别人长处、从善如流的文化，我们对此感到自豪，我们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一切长处，我们向加拿大、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学到很多，但我们是选择地学习，并使之符合自己的国情。我认为现在西方可以借鉴中国不少经验，包括中国治国理政的一些方法和理念，毕竟中国崛起得非常迅速，过去40年里，中国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3倍。

**【主持人】** 稍微打断一下，让我们展开谈谈其中一些观点。您在此描绘了一个有意思的画面：中国视角认为西方自由民主过于程序化、宪制性僵化，做不了长期规划，那中国人怎么看待美国大选呢？他们会不会想，要是我们每四五年也有一次大选该多好，还是他们看到美国选举之后会说，这是国外的东西，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呢？

**【张维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制度安排的国家，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朝就有了科举制度，所以中国的体制或多或少是建立在我称之为“选拔”的基础之上的。放在今天，我们的做法叫作“选拔加选举”，这是我们中国产生领导人的政治模式。你在担任当前职务之前的工作表现是重中之重。举个例子，中国体制内的最高执政团队的七位成员，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两次出任一个省的一把手，考虑到中国的巨大规模，这意味着，他管理过至少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这样他才能获得提名资格。基于这点，我真的认为美国体制很难运行好。

**【主持人】** 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通常不能看到中国选拔制度的优点。在中国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治理制度并非从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才开始，相反中国建立自己的治理体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您能不能再多谈谈这个？以及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人真正接受了这种机制，作为当前体制合法性的一部分？

**【张维为】** 因为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之中，从公元前221年起，中国就已经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已有两千多年了，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都是统一的。从那时候起，中国一直是个大国，一个大陆文明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百国之和”的国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治理难度极大，人均资源又明显少于多数国家，所以这种选拔精英来治国理政的文化就应运而生，也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考核来选拔能干者，来组建不偏袒一方的相对比较中性的政府。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不想提特朗普了，你要让中国人接受奥巴马、小布什这样的人做领导人，都是难以想象的。按中国人的标准，他们都不太够格，他们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

**【主持人】** 这太有意思了，当中国人想到自由民主，会有任何让他们羡慕的特质吗？请原谅我的无知，我只是想了解，在中国，人们是否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人们会不会想，我要完全以个人的意愿来定义我的身份，来过我每天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信仰？这种想法在中国广泛存在吗？或者说中国人会羡慕美国人追求的这种理想吗？尽管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追求有时

候会产生混乱。

**【张维为】** 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震惊：为什么西方价值观会把所谓的“自由”摆在首位？这大概是因为西方人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没有过自由。当他们最终获得自由时，他们对此便无比珍惜。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看看中国的土地制度，大多数情况下，土地买卖都是被允许的，所以从经济层面看，中国比同时期的欧洲要自由得多。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国有句古语叫“山高皇帝远”，言下之意就是个人有很大的自由。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在西方文化里，自由会成为重中之重？我们看到一项对华人社会做的很有意思的民调，无论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是中国大陆如果要按重要性排列价值观，假设世界上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的话，由于文化差异，人们对价值的优先顺序有不同的排序。在华人社会里，排在第一位的总是社会秩序；而在美国，排在第一位的总是言论自由。而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是相当有限的，更别提在政治生活层面的言论自由了。

**【主持人】** 请问中国如何看待“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如何看待北美以及欧洲的种族问题？中国如何看待西方面临的困局？一方面，西方要调节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尽管不太成功，西方又要努力让少数族裔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同时让他们延续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利益以及信仰。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维为】** 这对于西方社会尤其美国是一个挑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种族关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去过美国很多次，常常发现种族间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它基于你居住的社区、你的住所、你受的教育、你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必须下大功夫，才能构建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近几十年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你总能发现身份政治的身影，身份政治是分裂人群的。我记得一个月前，我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有一次对话，我们谈到美国种族关系的改革。他随后提到美国改革成功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有“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等。我说那时候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壮大，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但如今美国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再加上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导致中产阶级内部分裂严重，所以改革变得越来越难，这对于西方社会而言是一项巨大挑战。

**【主持人】** 是的，虽然我很想一直和你聊下去，但我不能太贪心，我们得进入听众提问环节了。维为，他们在节目前就有许多问题想问您，而且鉴于我们是直播的形式，听众朋友可以通过邮件实时提问，还可以在 [munkdebate.com](http://munkdebate.com) 上留言提问。第一个问题来自 Tom，我来读一下他的问题。他说，“在西方，我们通常会将国家与政府分开看待，我也是这样看待中国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开始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在谈及中国的未来时，除了共产主义还有别的路可走吗？请分享一下您的看法”。维为，您肯定对共产主义有强烈的情感和信仰，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共产主义是否已经和中国未来发展密不可分？您能想象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吗？

**【张维为】** 把中国叫作共产主义国家其实是不准确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是中国的极其积极正面的力量。这点在中国是常识，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很有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各种误解。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是“百国之和”的国家，在过去两千多年间的多数时间内，中国都是由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的，你可以称之为“一党制”，中国共产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若非如此，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中国在1911年尝试过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却沦为军阀混战，数百万人丧命。这是惨痛的教训。更重要的是，我多年前就说过，中国已经找到了走向成功的现代化的道路，虽然这个模式并不完美，但它的确对中国有用，它能与西方模式竞争，中国并不害怕同西方竞争，不害怕与西方政治制度和模式的竞争。我可以简短概括一下中国的模式：政治上，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是“选拔加选举”；经济上，采用混合经济制度；在社会领域，社会与国家呈良性互动。总体而言，这一模式运作良好，因此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我记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天前说，中国是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不要被它描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吓住，中国采用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融合，成为汉传佛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许多要素。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维持着统一并一步步崛起至今。不要把中国看作另一个苏联，两者完全不同。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四亿真正的中产，这些人到加拿大也是中产，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主持人】**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今晚的节目就是为了向您学习，了解您的观点。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主要是为了对话，而非辩论。如果你想看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可以去我们的官网，那上面有很多辩论。事实上张维为教授还和我们的朋友牛津大学的蒂莫西·艾什（Timothy Ash）教授就自由民主和中国模式展开过一场精彩的辩论。我们的网站上有这场辩论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是对话而不是辩论。下一个问题来自观众GB，这个问题刚好涉及您谈论到的内容。他问：“在你看来，如今2020年，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或者你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和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活水平上有哪些主要区别？你怎么看呢？可否通过描述这些差异，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并且讲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中国模式更好？”

**【张维为】** 如果你看一下统计数据，比较中美两国的数据，比如家庭中位净资产，去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在10万美元左右，确切来说是97 000美元，而中国城镇家庭的这一数据，是美国的两倍多，超过20万美元。所以这是中国巨大的进步，虽然数据仅涵盖中国城镇家庭，但中国的城镇家庭人口超过7亿，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农村家庭中位净资产的数据，明年也许会有。如果拿上海和纽约进行对比：以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纽约比上海高大约四倍，上海为2万多美元，纽约为8万多美元；但如果以家庭中位净资产为标准的话，上海则高于纽约；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上海高出纽约4岁，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3岁，纽约是79岁；如果看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至少好10倍。还可以看西方主要民调机构开展的调查，像皮尤、益普索、亚洲动态等机构的调查。例如，在去年的益普索调查中，9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40%，英国是21%。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西方媒体没有勇气向世界说出这个简单的真相，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感觉良好，对自

己国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我们看清了这一点，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清晰。

**【主持人】**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曾在芒克辩论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每年有1亿多中国人去世界各地出差旅行，假期过后，这1亿多中国人返回中国，说明这些人不想离开中国。我们知道，他们不像过去铁幕国家的人，都想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是有原因的。接下来是来自Allen的问题，挺有挑战性的。他说：“我们很难忽视有关‘维吾尔族人被压迫’的指责，这种中国内部政府治理方法，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国价值观？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什么特点？你能和我们讲讲吗？我们这里有很多关于新疆形势的报道。”

**【张维为】** 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相信这些报道。我们认为这是西方的政治宣传，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相关机构编造的。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搞乱了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和利比亚，现在他们又想搞乱中国的新疆和香港，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考虑到新疆在过去多年发生过一些恐怖袭击，某些临时的限制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所有法治国家都会这样做。你看看过去几年新疆取得的巨大进步：连续三年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巨大的成就。去年新疆接待的游客数量达到了2亿人次，这在新疆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了解这些大背景，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新疆。你看新疆的现代化水平，比其周边的中亚邻国的省、市都高。新疆有希望最终在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的地区中的最发达经济体。这是新疆人民和其他中国人可以为国际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伊斯兰文化圈需要一个超级现代的经济体。

**【主持人】** 在西方，我们常常告诉自己这样一个观点，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即多元化就是力量。我们希望生活在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社会。在我们的访谈对话中，您曾谈及中国的多元化，中国的区域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中国人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怎么看？大家觉得这值得庆贺吗？还是把它视为中国发展中的巨大障碍？

**【张维为】** 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都是多元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我记得上次在与艾什教授的辩论中，我提到了文明型国家，我说，如果您看一下典型的上海人、北京人和广东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大于典型的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在同一文明下共同生活了数千年，因此我们欣赏这种多元性，我们在和谐中看到多元，多元中看到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的优势之一就是把握一个度。与西方不同，你们往往把权利看成绝对的，没有让步的空间，中国人认为凡事要有个度，必须要有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和而不同，中国既非常多元，也非常统一。我们这一点做得很好，用法语中的词就是mélange，指各种事物融合在一起，或者叫多元一体，一体很重要。这种多样性带来精彩，在中国内部旅行，你飞行三小时，在加拿大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你会看到文化差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食品、音乐和方言，多种多样，但是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很重要。

**【主持人】** 好的，很高兴了解到这些，接下来这个问题，把我们的对话转移到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上。Dan 问：“中国的治理制度是否适用于其他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国家？具体一点，中国是否想输出中国模式到发展中国家，以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您总是非常热情地谈论和称赞中国模式，这就让我在想，您是否希望看到世界其他地区，为自己的进步和发展而拥抱中国模式，也许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张维为]**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是，我们没有弥赛亚传教的传统，没有去改变他人信仰的传统。中国人的哲学是如果我们的模式很好，我们很乐意分享经验，介绍中国模式，但是我们绝不会尝试将此模式强加于人。如果有必要，你们可以看看中国模式是否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如果你不感兴趣，我们也不会太在意。对于中国模式，我们的态度是很开放的，这与美国的做法大不相同，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然后通过间谍活动或者发射导弹强加于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在这个方面，也许中国文明更加成熟一点。我们认为，每个国家最终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与众不同的道路。但是一旦你取得了成功或相对的成功，许多国家就会向你寻求一些帮助，甚至是指导。在非洲，你会看到他们的口号，如“向东方看齐，向中国看齐”，但这不是中国强加给他们的，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我们愿意分享经验，别人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中国人从西方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是有选择地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西方制度，这就可以了。

**[主持人]** 您会如何回应这些人，包括蓬佩奥，您在之前那场辩论中提到过他，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向参与国带去经济繁荣，这是表面的，“一带一路”倡议会成为中国领导建设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一部分，横跨中国和整个亚洲并进入欧洲。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具有政治意义，特别是推广中国人的组织形式和理念呢？

**[张维为]**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产品。我认为这是基于一种非常积极的原则，即共商、共建、共享，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入这个倡议，中国不强迫你加入，背后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巨大差距。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严重落后，从公路、铁路、机场到各种电信和 IT 技术。然而数十年来，许多国际机构都以西方模式为主导，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需求，现在中国开始填补这个缺口，这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都来参与，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已经开始参与，它确实是一个平台，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一些国家说，“来帮帮我们吧，你们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吗？”中国就尽力提供帮助。他们发现中国人也很善于制订规划，一些国家就会说，“嘿，来帮我们规划一下吧”。如果说，这就是中国在扮演更大的政治角色，为什么不呢？这再正常不过了。这是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尊重主权平等，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同时这也是商业行为，所以我认为这没什么问题，不要把一切都政治化。中国成功的秘诀是：西方从英国开始就一直执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他们眼里总是有坏人、好人，坏的国家、好的国家，它们是彼此对立和对抗的。而中国哲学是“团结繁荣”，或者叫“和而富之”（unite and prosper）。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社会，我们对非洲人说你们要团结起来，我们也支持东南亚、东盟，你们要团结起来，越团结越好。所以这不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心态，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态。

**【主持人】** 太好了，谢谢您。Tamara 有个问题要问您：“中国所谓的‘战狼外交’已经激怒了欧洲、亚洲、北美的很多国家，一个强大、安全、自信的国家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官员对加拿大的语气更加咄咄逼人，你怎么描述它呢？我们该做何解释呢？”

**【张维为】** 作为中国人，我们早就习惯听到西方和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说教。所以我想西方也应该开始习惯中国人给他们上上课。这也许就是“战狼外交”，具体的上课方法也许可以更加精致完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赞赏，虽然很多西方国家不赞赏，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是少数，尽管他们的影响很大。如果你看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辩论，在涉及中国新疆和香港的问题上，大多数成员国都支持中国的立场，通常数量是支持西方立场的两倍多。

**【主持人】** 精彩的回答。Greg 问：“特朗普改变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倾向，从合作共识变成竞争共识，你们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这种态度变化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与中国的发展有无关系？”

**【张维为】** 是的，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与中国对抗的共识，甚至是所谓“新冷战”，我认为最终中美这两个大国必须找到一条和平共处的合作之道。看看拜登的政治议程，他在竞选演说中说，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四大挑战：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和前所未有的种族分裂。在种族分裂问题上我们帮不了忙，但在其他三个方面，即在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上，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帮助。我希望如果最终拜登上台的话，他会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团队应该更成熟，因为我记得拜登曾对特朗普开玩笑说：“特朗普，请你赶快长大吧。”我希望美国在拜登和他更为成熟的团队的领导下，我们两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合作空间。一定会有许多领域的竞争，但也会有许多领域的合作，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一种更成熟的态度。

**【主持人】** 在拜登政策方面中国的“红线”是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接受什么？有人说要重建一个 21 世纪的民主国家联盟来延缓中国的崛起，延缓是一回事，遏制中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是另一回事，所以中国现在的“红线”是什么？

**【张维为】** 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联盟，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首先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中国无意输出其意识形态，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把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 4 亿人，中国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走在新技术革命的最前沿，中国还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供应链，中国也是 130 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和文明型国家，你是无法遏制的，没有办法结成联盟对抗这样的国家。我记得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几天前说过，“不要去建立对抗中国的联盟，这不是正确的方法”。他也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主持人】** 基辛格本人曾经是芒克辩论的嘉宾，今年秋天也发表了一些言论，警告世界，现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我们处于中美的竞争之中，螺旋式升级的竞争，它与各国真正的利益相悖并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是军事冲突。您认为这有可能吗？中国认为这种结局可能发生吗？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吗？

**【张维为】** 亨利·基辛格是政界元老，以他的年龄和经验发表意见，他的话显然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很多智慧。国际社会、中国和美国都应该防止他所说的一战情景的发生。他的这番话也让我想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战刚结束后来中国访问时所说的一番话。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我们应该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让中国强大起来。罗素却建议中国说，我们刚刚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西方军国主义文化发疯的产物。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化中对和平的热爱。他说了一个很在理的观点：他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将具备足够的自卫能力。当时中国没有这种能力，如今的中国拥有强大的自卫能力。他说，在有自卫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的热爱和平的文化将是国际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我认为现在到了中国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是认真的。我在想，要是美国的特朗普能接受这个理念，哪怕他只接受这个理念的20%或30%，他对这次疫情的处理就可能好上10倍。比方说，他本可以寻求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和咨询，可以寻求中国的合作和咨询，他可以做得好很多很多，然而他没有这种意识。新冠疫情再一次表明国际社会真的是相互依存的，人们除了互相帮助，别无选择。

**【主持人】** 相信您常听到，中国出现了鹰派力量，他们想更直接地对抗美国，以维护中国的权利，特别是在南海地区，但更多的是想要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是对中国军方的一种误解吗？中国是如何看待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呢？

**【张维为】** 其实所有大国中，甚至在小国，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些强硬，有些不那么强硬，有些非常平和，这都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最近中国确实被美国咄咄逼人的做法冒犯了。美国侦察机成天飞到中国边界，飞到中国岛礁设施附近，美国还向台湾出售先进的导弹和武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侵犯性的举动确实冒犯了中国。我们明白这与美国大选政治有关，为了满足特朗普的竞选需求，他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本国问题、从疫情灾难中转移出来，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不成熟的领导。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否则会很危险。中国是个崇尚和平的国家，我们修长城抵御入侵，而不是入侵其他国家。15世纪，当中国比欧洲强100倍时，中国派海军下西洋，我们没有殖民任何国家，我们没有这样的基因。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和平共处，而不是以强欺弱，那不是我们的态度。当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我们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鉴于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收复所有失去的南海岛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愿意与邻国协商谈判、解决分歧。反观19世纪末的美国，18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便对西班牙发动了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虽独立的古巴实际沦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中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我们对军事力量的使用非常谨慎，这是基于中国古代先哲孙子的“慎战”思想，这对国际社会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学习。我记

得吉米·卡特曾告诉特朗普他对中国超越美国原因的看法，他说在过去的250年中，美国一直在打仗，除了打仗还是打仗，只有16年没有战争，而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差距就这么形成了。中国将资金投到基建和科技，这就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差别。但是中国是有底线的，任何国家都不能越界，越过底线就会发生军事冲突。

**【主持人】** 在我们进入著作推荐环节之前，我想帮 Margaret 问一个关于加拿大的问题。她想问您：“加拿大应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中加关系日益紧张，在中国两名加拿大人以间谍罪被起诉，有一名中国的通信公司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联邦调查局拘捕。您有什么建议呢？不仅是加拿大，还有夹在中美之间压力越来越多的一些小国，坦白说，要选边站队，加拿大应该怎么做呢？”

**【张维为】** 对于中小国家来说，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中国和美国之间，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与我们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这绝对不是中国的想法，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是朋友，或是最终可以成为朋友，这是刻在中国传统里的。即使现在我们与加拿大之间有一些困难，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再次成为好朋友。有点可惜呀，其实整体来说，加拿大在中国的声誉一直不错，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加拿大与中国保持了近五十年的良好关系，但这起拘留华为高管孟晚舟事件，真的寒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华为在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大家对此感到愤慨。而且即使就法律层面而言，我们认为加拿大应该有点勇气，就像做人也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而不是成为美国的帮凶。以我对案件的了解和有限的法律知识，加拿大法律中有“双重犯罪”原则，显然这起指控并没有违反加拿大当时的法律。很明显这是一个扼杀华为、扼杀中国技术发展的政治图谋，但这是行不通的。我记得，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和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及知名学者都敦促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我也希望加拿大这么做。回头看看，你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运用智慧和外交，找到一种既可以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又不得罪美国的办法，就算在特朗普执政之下也是有办法的。许多其他国家都找到了这种方法，小国也能做到，为什么加拿大做不到呢？我认为还是有机会能做到的，希望加拿大政府尽快释放孟晚舟。

**【主持人】**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让我们开始著作推荐环节，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读者进入您的脑海，您会建议大家去读哪些英文书籍来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刻？我来念您推荐的几本书的书名，您来简要给出推荐这些书籍的理由，第一本是《中道今来：中华传统与天下新秩序的重建》。

**【张维为】** 这本书是著名学者王赓武写的。实际上他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做了相当详细和广泛的讨论。中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同时，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所以称之为“重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自己文明的独特国家。我觉得这本书的读者会受到启发。

**【主持人】**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第二本书是《中国哲学简史》，我也非常感兴趣，您来谈谈吧。

**[张维为]** 这是一位已故多年的、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经典著作。但我认为他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探讨中国哲学史的最精辟的著作之一。我认为它非常值得一读。他在书中对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其他宗教和哲学理念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这些不同宗教可以共存、互相借鉴。所以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宗教战争的国家。不同宗教可以共存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主持人]** 是的，很棒，您最后推荐的一本书是《天下体系》。

**[张维为]** 作者赵汀阳是一位中国当代哲学家，他在书中讨论了一个中国传统观念“天下”。用中国传统理念来指导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换句话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观、不同的政治体系可以共存，然后互相借鉴、互相学习，都在这同一片天下，实现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

**[主持人]** 在我们的合作伙伴 Indigo 网站上你可以找到所有的推荐书目，上面还有其他推荐书目，包括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著作的英文版。张维为教授，非常感谢今天能与您对话。说实话，关于中国，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现在我们作为各个国家的公民，都在面对全球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人对这些挑战的看法。所以我非常感谢您以及您今晚与我们所做的分享。

**[张维为]** 谢谢鲁德亚德，我也非常感谢您的友好邀约和今晚这场精彩的对话。

受访嘉宾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理事长